

# 台灣學術場域的知識生產、傳播與消費 ：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出版分析\* \*\*

陳明莉

英國伯明翰大學文化研究與社會學系博士研究生

## 摘要

本研究運用 Wallerstein 的世界體系理論及 Bourdieu 的場域理論，並引用實際的數據，從語文應用、國際書市、留學人口及文獻引用四面向，檢驗世界知識的生產、傳播與消費活動，以探究「知識的世界體系」的形構。繼之，本研究從學術資本與行動主體的主客觀關係位置，分析世界知識場域的競爭與運作機制。最後以實證研究方法，針對台灣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系所的教師進行調查，以理解大學教師在知識生產、傳播與消費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

本文認為，世界上知識的生產、傳播與消費確實在世界體系中進行，與經濟的世界體系一樣，具有階層性、不平等交換及動態關係；而調查結果顯示，台灣學者從事的學術活動，仍然具有邊緣性格，在知識的世界體系中，扮演西方核心國家知識傳播與消費的角色。本文主張，深化外來學術及理論，對本土學術增加關注，並建立自己的學術出版體系將有助於改善台灣學術邊緣化之現象。

關鍵詞：學術出版、場域理論、世界體系、知識生產、知識傳播、知識消費、學術自主性

---

\*收稿日期:民國九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接受刊登日期:民國九十一年七月一日

\*\* 本文初稿曾於第三屆社會科學理論與本土化研討會(嘉義：南華大學，2002年4月12日)發表。作者感謝所有撥冗回答本論文問卷的大學教師，以及研討會與會學者、《教育及社會研究》兩位匿名評審所提供之意見。

\*\*\* 由於篇幅所限，本研究所有統計表格皆省略。

## 一、緒論

二十世紀末，由於後現代性 (postmodernity) 論述的崛起與後殖民主義 (post-colonialism) 文化意識的覺醒，激發了第三世界洶湧澎湃的「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 或「去中心化」(decenterization) 思潮。在此潮流下，台灣學術界則在「本土化」<sup>1</sup> (indigenization) 的議題下，產生豐富多元的論述，雖然有助於學界人士的反思，也促成某些強調「本土」(localization) 刊物的誕生，但有時不免陷入典範之爭或化約為意識形態的論辯，尤其在說歸說做歸做的理論與實踐分離下，甚至只是淪為「喃喃自語」或是 Homi Bhabha (1994:86) 所說的「牙牙學舌」(mimicry) 而已<sup>2</sup>，實際上仍然無力拯救台灣學術邊緣化的地位或知識產能低落的危機。從知識經濟的觀點而言，知識是有價的商品，涉及到生產、傳播與消費的過程。台灣學術發展若不能擺脫對西方的依賴，發現內部生成的動力，產能低落或是不具市場價值，所謂本土化的主張，也僅是沒落士大夫頹廢消遣之詞或自我慰藉的空談罷了。因此與其停滯在本土化思考的僵局，倒不如直接切入知識生產的議題，分析其產銷的體系與市場機制，或許能夠另闢蹊徑，明白其中更多的現象與道理。

知識生產的研究，學術出版 (scholarly publishing/academic publications<sup>3</sup>) 是客觀的分析對象。學術出版是賦予知識正當性的最適當途徑，它是經濟、智慧和文化體系的複合物，也是學術論述的主要傳播工具，更是具現知識客體化的形式 (Swales, 1990;

---

<sup>1</sup> 社會學上的「本土化」(indigenization)也可以被翻譯為「內生化」，意即從內部生成的。葉啟政教授的定義是：「具特定空間意涵之關係性的啟動式活動，指向的是一個地區之自主性的追求和肯定，也是主體性的形塑和展現。」available: <http://www.tsen.com.tw/news/comment/c9007/c900722.htm>

<sup>2</sup> mimicry有人翻譯成學舌、諧擬、番易或翻易(取其翻譯及變易之意)，為後殖民論述學者 Homi Bhabha 在 模仿與人：殖民論述的含混 (*Of Mimicry and Man: The Ambivalence of Colonial Discourse*)一文中的用語，用來指稱被殖民者使用殖民者的語言，模仿殖民者的言行舉止，卻又明顯的可看出兩者的差異。

<sup>3</sup> 本研究學術出版指的是專為學術工作者、大學任教的學者、其他學界人士和大學學生而寫的書籍、期刊和論文，在形式上包括印刷、電子書和線上文章，在內容上包含學術書籍、大學教科書與參考書。

Canagarajah, 1996; Brodkey, 1987), 也因而藉由學術出版, 知識的生產、傳播和消費, 即變成可客觀觀察和分析的對象。

西方學術界的流行諺語「出版或淘汰」(publish or perish) (Lorimer: 1993: 207), 說明了學術出版活動對學術研究者的重要性。實際上, 大部分的學者為保有工作或獲得陞遷機會, 必須維持一定的學術出版量, 他們對知識的貢獻、聲譽, 甚至接近資源的機會與實質的報酬, 也往往以其學術論著做為評估的依據, 這種情況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尤其顯著。

此外, 出版是學術圈主要溝通互動的管道, 因此學術出版也具有凝聚學術社群的功能 (Brodkey, 1987), 甚至被稱為一種「可見的不可見學院」(visible invisible college)<sup>4</sup> (Altbach, 1987: 176-78, Lingwood, 1969; Paisley, 1972; Price, 1961)。這種無形學院雖非學術正式組織, 卻對學術知識的生產與傳播具有重要影響力, 誰在學術出版處於中心位置, 誰就擁有學術的核心權力 (Altbach 1987: 176-78), 進一步主導學術思潮, 左右學門領域的發展, 刺激跨學門研究的興起 (Barnett and Low, 1995: 3-4)。美國「芝加哥社會學派」(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 的興起, 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即扮演重要的催化角色 (Leavy, 1996: 30); 法國學說在歐洲內陸的擴增與發展, 也與其論述大量被轉譯為英文出版品息息相關; 而文化研究此一跨學門領域的形成, 其實是出版商為擴大市場, 策略運用下的產物 (Barnett and Low, 1995: 16-18)。

1709 年, 英國通過世界首部著作權法「安妮法案」(Statute of Anna), 奠定了「知識有價」的觀念 (Owen, 1993), 原本無形無體的知識, 一旦賦予出版品的形式, 即成為私人財產, 不容他人非法侵害。在知識經濟的時代, 知識如今已逐漸變成跨越疆界的國際商品, 成為生產、行銷和消費的客體。然而, 若知識有價, 則價值與

---

<sup>4</sup>十七世紀, 英國倫敦皇家學會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首創「不可見的學院」(invisible college) 用詞, Lievrouw (1989: 622) 修正後指出, 「不可見的學院」是擁有共同旨趣的科學家或學者之間, 所存在非正式溝通關係; 而 Altbach (1987: 176) 則認為透過學術出版, 使「不可見的學院」成為可見。

價錢由誰決定？若知識真是商品，則在國際知識市場上，它是如何被生產、傳播與消費？誰是主要的生產者？誰扮演知識的推銷員？誰又是心甘情願的消費者？其背後的運作機制、權力關係如何？在全球知識經濟的時代，台灣在整個世界的知識市場中又處於何種地位？台灣學者扮演何種角色？實是值得目前學術工作者關心的議題。

為解答上述問題，本研究嘗試運用 Immanuel Wallerstein 的世界體系理論 (world-system theory) 及 Pierre Bourdieu 的場域理論 (field theory)，以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出版為分析對象，探討全球化脈絡下，知識世界體系的發展及其運作的機制，並分析台灣學術場域知識的生產、傳播與消費活動，以進一步探究台灣在知識世界體系中的角色與位置。

首先，本研究將引用實際的經驗與數據，檢驗世界知識的生產、傳播與消費活動，以探究「知識的世界體系」的形構 (formation)。換言之，本研究在探討全球的知識場域中，所呈現的階層性 (hierarchical)、不平等交換 (unequal exchange) 及其動態 (dynamic) 關係。繼之，本研究將從學術資本與行動主體 (agent) 的主客觀關係位置，來分析世界知識場域的競爭與運作機制。最後以實證研究方法，針對台灣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系所的教師進行問卷調查，以理解大學教師在整個知識生產、傳播與消費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

## 二、知識的世界體系

1960 年代及 1970 年代初期，民族主義運動興起，反霸權、反帝國主義和新殖民主義成為此一時代的主題，學術領域中也出現了一股強而有力的「反現代化」、「反西方理論」和「反歐洲中心主義」的思潮。例如 Joseph Schumpeter (1883-1950) 和 Karl Polanyi (1886-1964) 從經濟學的角度，對宣揚現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觀點提出了挑戰，並指出西方的發展是以犧牲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為代價

(Schumpeter, 1939 ; Polanyi, 1944)。Immanuel Wallerstein (1930-) 則建構出「世界體系」理論，更深入的解釋資本主義、工業革命的發展，以及「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之間複雜連結關係及其起源 (Wallerstein, 1974)。

Wallerstein 的世界體系理論以經濟和勞動為建構的基礎，說明體系的等級位階及不平等交換的運作機制，然而在知識生產的世界是否如同 Wallerstein 的世界體系理論，業已形成或逐漸形成核心、半邊陲及邊陲地帶的階層結構，以及不平等的交換關係，有待客觀的實據證明，而語文運用、國際書市、留學人口、文獻引用可以做為本研究的論述基礎。

### (一) 語言與文字-主宰資訊傳播的符號系統

語言與文字是以符號為形式的各種資訊溝通系統，也是思想和文化的傳播工具，從各種語言與文字的使用與其圖書被翻譯成他種語言的比例，可看出該語言或文字在世界的地位。

統計數據顯示，世界上大約有四分之一的圖書是以英文出版的，而法文、俄文及德文又佔有另外四分之一 (Euromonitor, 1992: 20; Curwen, 1986: 18)。實際上這些語言對世界圖書的佔有率及影響力，更遠超於此，因為許多非法、英、俄及德文的書，仍然是由這四種原文翻譯過來。

眾所皆知，各種數據也顯示，英文是目前世界上需求最高、銷路最好的語文。早在 1980 年代，世界各國就有超過 40% 的翻譯書譯自英文，其餘依序為法文、德文及俄文，三者各佔 8% 至 12% 之間 (Curwen, 1986: 21)。很明顯的，這四種語文是構成全球知識體系核心的語文群 (language group)，世界上有 73.8% 的翻譯書，是從這四種語言轉譯而成 (Euromonitor, 1992: 20)；半邊陲的語文群為西班牙文、義大利文、丹麥文、瑞典文、波蘭文及捷克文，各約有 1% 至 3% 的佔有率；其餘語文如中文、阿拉伯文及葡萄牙文，雖擁有不少的使用人口，但在世界翻譯的體系中，只能成為邊陲符號系統

(Heilbron, 1999: 434)。顯然的，語文的宰制勢力並非依賴於使用人口的多寡。

此外，在世界的知識生產、傳播與消費過程中，可發現一種邊陲忽視的現象，知識文化愈處核心的國家，愈對其他國家的知識文化表現冷漠。以語言的翻譯為例，在國際翻譯體系中，愈處核心的語言團體，愈少翻譯其他語言的書籍，例如自 1945 年以來，英國及美國境內只有低於 5% 的書來自翻譯，英國 1999 年甚至只有 1.8% 是翻譯書（110,155 種新書中，只有 1,968 種來自翻譯）(Bookbank, 2001)；法國及德國國內翻譯書的比例，自二次大戰後一直保持在 10% 至 12% 之間；至於半邊陲國家，翻譯書在其圖書市場一直佔有相當的份量，義大利及西班牙達到 12% 至 20%，瑞典及荷蘭則有 12% 至 25% 的書籍屬翻譯書；在希臘則高達 40% (Heilbron, 1999: 436-40)；台灣則至少有 33% 的圖書來自外文翻譯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1998:203)，而這顯然是低估的數據。

語文的宰制勢力涉及世界體系中的文化與知識交換的操弄，在國際學術的交流活動中，核心國家更扮演邊陲地區知識中間人的角色，發揮揀客的篩選、推銷作用，進行知識的加工與銷售。邊陲地區彼此的學術溝通，往往必須透過核心國家語言的譯介才得以完成 (Heilbron, 1999: 436-440)。其交流方式，通常是核心國家先將某邊陲的語言譯成核心語言後，其他邊陲國家才據此轉譯到自己國家。例如，錫蘭的學者想要了解阿拉伯國家的文化或知識，多數得透過英文、法文、或德文等核心國家的翻譯本，所以錫蘭學者直接購買的並非是這些邊陲國家的書，而是英文、法文或德文的譯本，邊陲國家若有意出版，還必須向核心國家購買版權。很明顯的，在文化、知識的譯介過程中，核心國家依然是最大獲利者，知識內容與價值的選擇、決定權力，又再一次落入核心國家的手中。經由符號轉換而得到經濟利潤，再累積符號資本，正是知識世界體系運作的要素之一。

## （二）國際書市--知識的銷售與產值

從圖書交易來看，在國際出版市場上，仍然呈現少數核心國家壟斷的局面。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2000: 10) 的統計，1998 年全球圖書出口總值為 106 億 2 千 7 百萬美元，其中五分之一來自美國，六分之一屬於英國，十分之一來自德國，這三個國家即壟斷世界上 47% 的圖書出口。

1990 年國際圖書貿易順差結餘最多的國家，依序為美國、英國、德國、西班牙和荷蘭，其中英國是進出口比例最高的國家，圖書出口是進口的 475%，其餘依次是西班牙、德國、美國和荷蘭。澳洲則是國際圖書貿易逆差最大的國家。

在最強勢的國際語言控制下，英文書籍在圖書市場也成為最大宗的買賣，美國及英國圖書在世界上有極大的出口量，1996 至 2001 年資料顯示，美國國際圖書交易順差最高曾達到 6 億美元 (The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s Office of Consumer Goods, 2002a; 2002b)，2000 年英國的圖書貿易順差甚至高達 8.5 億英鎊 (約 12 億美元)(The Publishers Association, 2002c)；其他已開發國家如義大利、西班牙、及德國、荷蘭也有相當的順差量，而法國、日本在國際圖書交易上並未獲利多少，甚至呈現逆差現象，況且日本的圖書出口部分屬於在其境內代印的其他語言的書，並非國內本土出版的書種<sup>5</sup>。

根據英國出版人協會 (The Publishers Association) 的統計，英國 1998 年期刊 (journal) 總營業額為 5 億英鎊，而出口營業額即佔了 3.9 億，換言之，英國期刊有 78% 的營業額來自海外 (The Publishers Association, 1999)。

英國圖書出口市場呈現逐年成長的趨勢，除了 1997 年由於前一年成長太快，而有小幅反彈外，出口市場從 1990 年的 5.3 億英鎊，

---

<sup>5</sup>國際書市的進、出口數據中，很少將印刷與出版區分出來，使得國際書市的狀況更加複雜難解。大部分圖書的印刷與裝訂，會在出版的國家內完成，然而，有一些國家，例如英國，有時會將實體部分的生產 (physical production) 交付海外執行，有時是印刷、裝訂皆在海外完成，有時卻是國外印刷、國內裝訂，有些書則為國際合作版 (international co-editions)，即彩色頁在香港、義大利或西班牙印製，而內文頁則交付各國自行印製 (Euromonitor, 1992: 24-5; Unesco, 1992)。

增加到 1999 年的 8.7 億英鎊，成長了 64%，到了 2000 年甚至增加到 11.7 億 (The Publishers Association, 2002a, 2002b)；成長最多的是學術或專業 (academic /professional) 類書籍，同一段時間，學術或專業圖書在出口市場上就成長了 113%，而一般大眾圖書 (consumer) 則只有小幅成長 (6.5%) (The Publishers Association, 2000)。

英國 2000 年圖書總營業額為 32.4 億英鎊，出口營業額為 11.7 億英鎊，故英國圖書出口佔總營業額的 36% (The Publishers Association, 2002c)。英國圖書出口市場也以學術或專業書最多，佔 38%，但此類書在英國境內營業額的比例卻只佔 24%。由此可見學術或專業書在英國書籍國際交易中的份量與其知識的產值。

台灣圖書的國際交易狀況，國內尚未有具公信的調查數據，但從美國商業局 (Department of Commerce) 的統計資料顯示，臺灣對美國圖書的交易，每年皆呈逆差現象，2000 年更達 2,750 萬美元。由此可見，台灣對美國的整體經濟貿易雖是屬於順差的國家，但在文化面向的圖書出版上卻是處於逆差的局面。

### (三) 留學活動-知識流動與文化殖民

留學 (studying abroad) 本質上是核心到邊際的知識傳播，也是文化殖民的管道，從留學活動中更能觀察出世界知識的生產、傳播與消費模式。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自二十世紀中葉起，即對世界留學人口展開記錄與調查。根據統計數據，美國無疑的是世界最大的留學宗主國 (host country)，自二次大戰後美國即已成為世界高等教育的核心 (Unesco, 1971 and 1994; Barnett and Wu, 1995; Ben-David, 1977; McMahon, 1992)。從留學生的人口變動來看，二十世紀的前三分之一時期，留學人口的流動方向，絕大多數的目標是德國及英國 (特別是來自其殖民地)，自 1950 年代開始，留學生的主要目的地則是美國、英國、法國及前蘇聯。

根據 Schott (1998, 112) 的研究發現，在科學的世界體系中，確實有邊陲與核心的結構存在。在 1930 年代，德國的科學成就凌駕各國之上，使其成為當時的科學中心，然而自二次世界大戰後，科學

核心逐漸移至美國。科學成就高的區域自然吸引世界各地的學習人潮，Schott 發現無論是暫時的停留或是永久的遷徙，學習人口的流動模式皆是從邊陲至中心，而科學思想的流動方向則是由中心到邊陲。

若依區域來看，1996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數據指出，81% 的留學生會選擇「高開發區域」(more developed regions) 為留學目的國，而「轉型中國家」(countries in transition) 及「低開發區域」(less developed regions)，只各佔 10% 及 9%，至於「最低開發區域」(least developed regions) 則幾乎沒有留學生前往 (Unesco, 2000)。這種核心到邊際的知識傳播極為明顯，從留學生的流動狀況而言，美國、英國、法國、德國、俄國成為知識的主要生產國家。1996 年「高開發區域」共有 476,391 位學生出國留學，其中 92% (438, 503 人) 仍然選擇「高開發區域」為留學目的地，選擇前往「轉型中國家」及「低開發區域」的只有 3.8% (18,054 人) 及 4.2% (19, 834 人)；這在歐洲國家尤其明顯，高達 94% 的歐洲學生仍然選擇留學歐洲 (Unesco, 2001)。

依據美國國際教育協會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簡稱 IIE) 的統計數據，2000/01 年，美國的外籍學生總數高達 547,867 人，其中以中國大陸最多，佔全美外籍學生人數的 11%，其次是印度 (10%)、日本 (8.5%)、南韓 (8.4%)、台灣 (5.2%)、加拿大 (4.6%)；以區域來分，留學美國的學生以亞洲為最多，佔全美外國留學生人數的 55.1%，其次是歐洲 (15%)、拉丁美洲 (12%)、中東地區 (7%)、非洲 (6%) 和北美 (5%)；而美國留學生所到的國家以英國為最多，佔全美留學生人數的 20.4%，其次是西班牙 (9.4%)、義大利 (9.0%)、法國 (9.0%)、墨西哥 (5.1%)、澳洲 (4.4%) 和德國 (3.3%) (IIE, 2001)。外國留學生到美國進修學門主要以企管 (19%)、工程 (15%)、數理與資訊科學 (12%) 為主；美國留學生到外國則以社會科學 (20%)、企管 (18%) 和人文 (15%) 為主。但外國留學生到美國大部分以取得高學位接受菁英教育為主，而美國留學生到外國則 90% 是從事一學期或暑期短期進修 (IIE, 2001)。

IEE 指出，2000/01 年，雖然外籍學生僅佔全美高等教育學生數的 3%，但每年對美國經濟，含學雜費、生活費及相關支出等貢獻超過 12 億美元，其中超過 75% 的外籍學生其財務來源為其個人、家庭，或來自美國以外的地區。根據美國商務部的數據，美國高等教育為其國內第五大的服務業出口，因為這些外籍學生將資金帶入美國，並提供其就學地區財務收入，包括食宿費用、書籍文具、交通、醫療保險、家庭成員開銷及其他雜項支出。

台灣學生到海外留學以美國為最多，其次是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紐西蘭、法國和德國（教育部，2001）。雖然由於市場分散、國內高等教育機會增加與經濟、就業市場的考量，台灣到美國留學的學生已逐年減少，但 2000/01 年仍有 28,066 人。反之，美國到台灣留學的學生，每年都在 200 人以下，而且是以短期停留為主。教育部將短期來台語言學習的外籍學生也計算在內，1999/2000 年在台留學生共計 6,616 人，其高低次序為印尼 (1,685 人)、南韓 (1,315 人)、美國 (737 人)、泰國 (156 人)、英國 (154 人)、加拿大 (146 人)、法國 (126 人)、德國 (108 人)、菲律賓 (95 人)、越南 (86 人)、其他 (684 人)。

#### （四）文獻引用--知識產值與學術認同

文獻的引用一方面是知識的交流活動，藉由書目的引用文獻，呈現知識的連結關係，另一方面文獻的引用也顯現學術認同的作用，更具體的是從文獻引用的頻率可看出知識的產能與產值。引用文獻的分析，由於客觀與量化的特性，長久以來已成為探討學術溝通模式、科學知識結構及學科界限的重要指標和研究工具 (Karki, 1996: 14)。

一般學者在進行引用文獻分析，大都選用「科學資訊協會」(Institute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 簡稱 ISI)、「科學引用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簡稱 SCI)、「社會科學引用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簡稱 SSCI) 或其「期刊引用報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 簡稱 JCR)，做為研究的資訊來源。Schott (1998: 130)

曾針對科學界的文獻引用情形進行分析，他認為從文獻的相互引用頻率來看，知識的流動是跨越國家與地域疆界的，然而，知識的流向並非隨機或均衡的，事實上，最主要的現象是世界各地研究者皆向知識中心（主要是美國）吸收及借用知識，科學文獻被引用最多的國家包括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日本和俄國，而他從縱長性的研究中亦發現知識世界體系形成的軌跡。

在文獻引用模式方面，美國是科學世界體系中最核心、最享有聲譽的國家，但也是最少使用外國文獻、最少在外國出版或發表報告的國家。美國科學家使用外國文章或書籍的比例是25%，日本及歐洲國家約在40%至71%之間，而開發中國家則在70%至92%之間 (Schott, 1991)，因而科學界間的跨國交流，並非均衡的分布，而是非常不平衡的交換過程。

而在人文社會領域，美國學術界的文獻引用，長期以來也同樣有大量使用本國語文文獻的現象：

1. W. M. Barnard (1957) 使用文獻分析法，對 1955 至 1956 年兩年間，七種圖書館學期刊中美籍作者的論文加以分析，發現英文文獻使用比例高達 95%。
2. D. L. Foster (1969) 計算 1963 至 1965 年間，美國五種圖書館學刊的文獻引用情形，發現只有 7.4% 的文獻是來自美國以外地區出版的期刊，而這些非美國出版的期刊中又有 51% 是以英文發行的。
3. J. W. Heussman (1970) 對七種神學期刊的 4,453 筆引用文獻以及 3,644 個神學院圖書館的流通紀錄加以分析，結果英文文獻被使用及引用的比例均居第一位，德文文獻次之。
4. 美國學者 C. A. Bolles (1975) 調查 *American Quarterly* 1949 至 1969 年文獻引用特性，結果該期刊 97.3% 的文獻為英文，其次依序為德文(1.0%)、法文(0.7%)、義大利文及俄文(各佔 0.5%)。

5. T. LaBoire 和 M. Halperin (1976) 對 1969 至 1972 年間十五所圖書館學校 186 篇博士論文的 2,139 筆引用文獻進行分析，發現英文文獻佔絕大多數 (88.6%)、德文次之 (5.6%)。
6. J. Omoruyi (1978)分析 1965 至 1970 年 Ibadan 大學 18 篇社會科學類博士論文引用文獻特性，結果引用語文以英文為主 (98%)。
7. Bottle 與 Efthimiadis 分析 1983 年 LISA、ISA、RZI、BS 及 CCA 等五種摘要性工具書中的內容，發現英文是最主要的發表語文，共有 71% 的文章以英文的形式發表。
8. J. M. Budd (1985)也有類似發現，其分析美國文學研究者的文獻使用特性，分析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MLA)出版的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 中有關美國文學的書目資料，結果仍以英文文獻的使用比例最高 (99.5%)，其次是法文、德文及西班牙文。
9. J. W. Coffman(1985)分析人文學科文獻特性，以 *The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為分析對象，結果英文文獻佔 84.42%，其次為德文 (6.3%)、法文 (6.3%)及義大利文 (2.1%)。

台灣學術研究的文獻引用，只有人文學門以本國語文文獻為主(但仍然遠低於美國各學門使用本國語文文獻的比例)，其餘領域仍以使用英文為多。台灣學者吳明德 (1987) 曾分析1986至1987年間，台灣公立大學研究生博碩士論文引用文獻情況，發現人文類以中文引用文獻為主，佔68.2%；社會科學類以英文為主，佔49.6%，科技類也以英文為主，佔84.2%。陳旭耀 (1997) 所進行的碩士論文引用文獻分析，發現最常被引用的語文是英文，佔50.0%，其次才是中文繁體，佔42.7%，中文簡體則佔3.9%。李德竹 (1992)就國內五所大專院校圖書館系所教師的著作進行引用文獻分析，結果顯示台灣圖書館學者進行研究時，以使用英文 (66.7%)最多，其次才是中文文獻 (33.1%)。鄭麗敏 (1994) 分析台灣七種圖書館與資訊科學期刊於1974

至1993年所刊載的論文，結果引用文獻仍以英文最多 (55.1%)。由這些研究數據可見台灣對英語世界知識的認同、借用與依賴程度。

### 三、學術出版與場域競爭

綜合以上論述，可以發現全球知識的發展軌跡與 Wallerstein 的世界體系理論極為吻合。當今世界知識的生產、傳播與消費，確實在一個知識的世界體系中進行，而此一體系是有階層的、不平等的、且動態發展的。

在知識的世界體系裡所呈現的層級、不平等的交換關係，背後所隱含的是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甚至象徵資本的佔有、分配與操弄，並藉此進行結構的再製，這種現象明顯的表現在學術出版上。學術出版不僅是個人學術、知識合法化的必要途徑，也是左右學術潮流、學術典範發展的利器，不可避免地成為學界必爭之地，因而學術出版乃成為知識資本或知識權威的爭奪的場域 (field) <sup>6</sup>。

學術工作者對知識的創造與生產，並不僅僅為了內在的興趣與滿足，而是往往為學術聲望或利益的欲求所驅使，有些學者汲汲營營於知識權威的追逐，而這種權威套用 Bourdieu 的用語，即是一種特別的社會資本，使其在學術場域的建構機制裡，擁有決定的權力，並可因而轉化為其他資本 (Bourdieu, 1991)。在知識的場域裡，學術研究者，或更廣義地說，是符號生產者，對於知識資本或知識權威、知識生產與再生產工具展開無止盡的爭奪與競爭，以企圖改變或創造既有的場域結構，而這樣的爭奪不僅發生在國家內部的知識場域內，更發生在於整個世界。

---

<sup>6</sup>依 Bourdieu 之見，所謂場域乃是附著於某種權力或資本形式的各種位置間的一系列歷史關係所構成的 (Bourdieu, 1992: 97)。因此在知識的生? 和傳播背後，總是存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權力運作。依 Bourdieu (1992: 97-122) 看來，每個場域都是充滿衝突和爭奪的，目的在確立與分配場域內能發揮有效作用的種種資本，和對該權力場域中各種權威形式間等級序列的壟斷。

誠如 Bourdieu 所言，每一種文化產品或每一場論述，實際上所展現的是一種地位的取得 (position-taking)，這種特別論述所產生的意義，是以與不同地位的其他場域論述之間的對話為基礎 (Bourdieu, 1993: 30-1)。依 Bourdieu 的觀點，各種生活領域，包括藝術、科學、宗教、經濟、政治等等，會分別形成不同的「微觀世界」 (microcosms)，各自持有他們自己的規則、條例與權威的形式 (Bourdieu, 1993)。出版並非單純的、僅依照市場邏輯運作的商業活動，在學術出版的世界裡，政治、社會和文化的決定因素往往凌駕於經濟的考量，其價格的決定，取決於社會文化因素更甚於經濟層面 (Lorimer: 1993: 209)。在知識世界體系、國際學術出版市場中，也早已建立一套評鑑系統與操控的技術，其主要的運作機制一是審查制度 (refereeship)，二是格式 (form) 的規範。

在學術出版上，審查制度主導了知識的內涵 (what can be written)，而格式要求則限制了知識的形式 (how it can be written)，這兩種機制是知識的生產、傳播與消費過程中，作用在知識生產者的一種社會控制，以確保典範地位與增進馴服的力量 (Crotty, 1999)。不可諱言，具有審查制度學術出版品多少可保證學術的品質，但也反映著向特定學術社群輸誠的傾向，成為學術社群認可的扣門磚，也是學術場域的控制工具。在學術知識的場域中，學術研究者爭奪的是對真理的解釋權，以及對知識差列排序的壟斷權，因而不可避免的造成衝突與競爭，然而這並非全然是個體間的捉對廝殺，而是具有相同利益者的集體作戰，而所謂的「學術社群」 (academic community)、「學門」 (discipline) 及「學會」 (institution) 便是這些力量的匯集處。由於知識生產無法與其形成和滋養的研究社群分離，也因而產生學術認同 (academic identities) 的作用。

這種自然科學的典範或社會科學的「概念模式」 (conceptual models) 的競爭，發生在學術機構內部或機構之間，也同時在知識的世界體系之中發揮作用，於是在知識的場域內，各自樹立山頭，從事維護門派或排除異己的工作。只要有威權的存在，便有權力運作的影子。概念模式的固著乃確保學術社群的秩序，以區隔、排除

「密醫」(charlatans)和「未烙飼主印記的小牛」(mavericks)(Crotty, 1999)。

知識並非絕對的真理或是單純事實的反映，更不是價值中立的產物，知識是社會決定、文化定置的(Crotty, 1999)，裡邊總是涉及既得利益的維護與權力的反動。就如 Foucault 所揭露的，知識是權力運作的要素，也是權力運作後的結果。知識必須透過出版，使其具體、有效，並合法化，那麼什麼樣的知識會被視為具出版價值？什麼才是知識？何種知識會被賦予權威？背後存在著複雜的權力結構與利害關係。

在複雜的權力結構與利害關係裡，學術出版公司及期刊的編輯部門，便是維護學術典範的守門人，而其所邀聘的匿名評審委員則是該典範的官方代表，他們通常在這個領域享有一定聲名，並握有相當資本，是知識場域中資本的支配者與分配者，最重要的，他們還必須是早已對這個典範表示忠誠的學者，換言之，必須是同屬一座學術山頭的自己人。

學術出版的評比或知識體系的層級，決定於兩個主要原則。首先是期刊或出版者的聲名，任何學門皆有某些出版者享有較高的聲譽，例如牛津大學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或哈佛教育評論(*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在學術出版上所享有的尊崇地位(Crotty, 1999)。其次是評審的設置，有評審程序的期刊的評比優於無評審程序者(章英華, 2000:21)，在台灣學術場域中，教師升等及國科會的年度研究獎助，便是以「有評審的學術期刊」論文，尤其是 SCI、SSCI 及 TSSCI 列名的期刊，作為評等的依據(陳世敏, 2001:6)。

眾所皆知，學術寫作不同於一般創作，它具有一定的格式及規範，想要以學術研究的名義出版，或在一份嚴謹、稍具學術權威的期刊上發表，首要關照的便是格式。拿投稿學術期刊為例，幾乎每份刊物都要求依其格式寫作，有的要求參照《美國心理學會出版手冊》(*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995) 或《芝加哥大學寫作手則》(Chicago Manual of Style, 1993), 在格式的規範認定過程中, 明顯表現台灣學術界的認同對象。

格式雖是芝麻瑣事, 卻已變成學者養成教育的一環, 成為學術寫作活動的基本常識。其實格式要求並非只是形式上的、或無關意識形態、無關學術意旨的, 其中隱然表達了對某個學術社群的順服, 攸關知識生產的政治學, 也反映了主流出版媒體的知識霸權。事實上, 這些寫作格式及慣例往往是主流學術期刊判斷是否接受來稿的第一判準, 如果不合規定, 文稿甚至連被閱讀的機會都沒有。斯里蘭卡的學者 Suresh Canagarajah (1996) 及 Bhatia (1993) 依其多年投稿主流學術期刊的經驗指出, 物價資源的缺乏與文體慣例的生疏等「非論述的障礙」(non-discursive obstacles), 往往導致他們被排除在國際學術論述之外, 造成第三世界學者被邊緣化的現象。

### (一) 學術出版的宰制機制

核心國家在學術出版場域中, 往往透過一套機制達成對出版資源及發表機會的壟斷, 並強化這種不平等的學術交換, 進而達到累積知識資本及其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這套機制大抵以語言工具和體例規範做為宰制的基礎。

#### 1. 語言工具與學術能力

在國際學術期刊中, 英文當然佔有絕對的優勢地位。Garfield (1978) 指出, 世界上有 80% 的科學知識是以英文寫成的; Baldauf (1986) 調查 1978 年至 1982 年間的跨文化心理學期刊, 發現以英文為媒介的出版品高達 97%。Baldauf 及 Jernudd (1983) 比較 1981 年及 1965 年的研究, 發現英文的重要性的確與日俱增; 即使在「熱帶農業」, 這個一般認為非西方所支配的學術領域, Arvanitis and Chatelin (1988) 依然發現有高達四分之三的期刊屬於英文, 其次是法文 (10%)、葡萄牙文 (7%) 以及西班牙文 (5%)。

英文不僅支配了主流的學術期刊, 也是國際學術出版市場的優勢語言。隨著英文的普及與強勢, 英美出版商紛紛將其市場鎖定全世界, 即便是非英語系國家的大出版商, 例如德國的 Bertelsmann 與

荷蘭的 Elsevier，為了攻佔全球市場，也都以英文書為其出版主力，甚至一些日本的出版公司也開始出版英文書 (Ghai and Kumar, 1984: 50; Russak, 1975: 106)。

當英語成為世界上大量知識的媒介，甚至形成英文就是「原文」的誤知時，它便成為支配主流學術期刊及學術出版品的語言，以英文寫作便成為知識生產的首要步驟。事實上，Edward Said 能以《東方主義》(Orientalism, 1978) 一書在國際學術論壇上大放異彩，與其以英文寫作及其本人在西方主流學術殿堂的位置不無關係。Said 並不是第一個討論東方主義觀念的人，早在《東方主義》出版前十多年，敘利亞學者 Abdul Lafit Tibawi 就已經在他的專題研究《說英語的東方主義者》(English Speaker Orientalists, 1965) 中涵蓋了相似的論點。許多邊陲地區的學者與作家也都在 Said 的《東方主義》之前即生產了談論東方主義的文本 (Sardar, 1997: 110-111)，但 Said 名聞遐邇，這些作家至今依然被忽視。

然而，對於非英文母語的學者來說，被迫以英文作為知識生產的媒介，非但不利，而且不公平。首先，語言表達上的不通暢，常被編輯視為論述上的或學術上的無能。Robert Kaplan (1966, 1976) 發現，非英文母語寫作者所使用的語法結構，明顯迥異於英美學術圈所偏好的修辭及思考模式。研究指出，大部分雙語或多語的學者會受其母語溝通習慣的影響，在寫作上呈現特殊的風格，而這正是被西方學者大量引為論述的或學術上的不適之處 (Canagarajah, 1996)；許維德 (1999) 發現，由於台灣學者習慣於中文寫作，「台灣研究」的中文世界出版品，無論質或量，往往超越英語世界出版的相關研究，但也因而失去國際的能見度。因此，台灣學者在國際學術界的地位，往往並非決定於學術實力，而在於英文的寫作能力與國際的能見度。

若以投資報酬率的角度來看，非英語母語的學者花費在學習外語的時間、金錢與精力，往往數百倍於英語世界的學者。為嫻熟一項外語，往往必須花費數年至數十年的時間，而閱讀、寫作非母語所消耗的時間、精力，又豈是母語使用者所能想像？更可悲的是，

不論邊陲學者如何努力，其外語寫作能力，依然難與英語母語學者匹敵，而其帶有文法瑕疵的寫作、平板簡單化的表達方式，卻可能是被主流期刊退稿的原因。當邊緣世界的學者，將大半心力交付語言的學習（有的甚至誤將英語當成知識的本身），核心國家的學者卻可將全部心力放在知識的創造與累積上，雙方知識產能的差距隨之擴大。

## 2. 寫作慣例與知識霸權

如前文所述，國際上的學術寫作格式及慣例表面上是客觀不帶歧視的，然而在純粹技術性的要求背後，卻有其知識生產政治學的涵義。Canagarajah (1996) 指出，即使邊陲學者能克服語意的或論述上的差異問題，非論述因素仍舊有效地將第三世界學者阻擋在外。Canagarajah 所指的非論述因素包括文本格式、書目及寫作慣例、用紙的重量與品質、所需影印的份數及郵費、投稿與校訂的程度及作者與編輯的互動等等，這些涉及科技的、經濟的與溝通的要求，對於核心國家的學者可能輕而易舉，但對資源匱乏的第三世界學者，卻非理所當然地具備，因而造成其知識生產、傳播過程的障礙。

擁有 SCI、SSCI 及 AHCI 三資料庫的國際著名引用文獻資料庫公司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ISI)，由於其選錄期刊的標準相當嚴格，只有 10% 至 12% 的入選率，各國期刊主編均以能被收錄為榮，因此由其評選期刊的標準，可看出當今主流期刊或有意躋身主流的期刊的要求，而時效性及英文參考文獻正是其評量高水準期刊的必備條件 (ISI, 2001)。

眾所皆知，一份符合國際學術寫作慣例的嚴謹著作，往往要求研究者參考該領域已出版的相關研究，並為自己的研究理論找定位，除此以外，還須呈交一份完整的英文參考文獻。對於投稿學術期刊的學術論文來說，更重要的是顯示出作者對當前正在進行的學術論辯有一定的警覺與了解，邊陲地帶的學者要符合上述條件著實不易。

Gibbs (1995) 訪談了十八個國家的四十位學者後發現，學者最大的抱怨是在學術邊陲地區的圖書館裡，缺乏足夠的期刊。學術期刊多次調漲價格及匯兌利率因素，使得邊陲地區的圖書館逐漸減少訂閱數量，而無法即時近用學術文獻的結果，使得邊陲學者的學術著作「不是看起來像老消息，要不就是將理論放置在不合宜的研究脈絡上。」(Canagarajah, 1996) 更糟的是，他們很可能重覆早已被核心學者發現或證實的研究 (Muchiri et al., 1995: 186)。如今隨著網際網路的發達，邊陲學者資訊落後的情況，已有某種程度的改善，然而到目前為止，並非所有的學術資源皆可在網路上自由、免費取用，更何況目前第三世界的網路普及率仍不理想。再者，長年積累的落後，也不是短短幾年內能追趕上的。其實，參考文獻的要求，其發揮作用之處，並不僅在排除資源匱乏的第三世界學術圈，其最大的功能乃在樹立其主流知識的權威性，更進一步鞏固其知識霸權的地位。

Bazerman's (1987) 追溯《美國心理學會出版手冊》的發展脈絡，發現對這些繁複格式的強調與執著裡頭，也可看出其用心並不僅僅在維持品質及格式的一致性而已 (Swales, 1990)。Swales 認為這是一種學術的形塑的過程，同時反映了期刊編輯與編輯委員會，對於他們想要促進或貶抑的研究領域及研究形式的立場 (Swales, 1990: 93)。這些複雜的要求顯示出，研究著作並非「一些固定的、不可改變的真相的銘文」，而是作者為得到出版機會，努力形塑、協商後的成品 (Swales, 1990: 93; Knorr-Cetina, 1981; Myers, 1985)。

這種寫作慣例，除了是對學術源流的尊重外，又何嘗不是對已出版的、已被認可的學術霸權的再度認可與順服？引用 / 加工支配性的論述，只為求取被出版的機會，套句 Foucault (1976: 224) 的用語，所謂「在真理內」(within the true) 說話，這都是一種意識型態的控制。研究者必須提出他的研究與之前的研究，特別是與核心學者的研究關聯，如此不僅是對核心出版品與中心學者宰制地位的正當化，也是一種意識型態的束縛 (Canagarajah, 1996)。

此外，為了呈現完整的文獻，學者必須依賴擁有大量書目的資料庫，世界知名的資料庫如 ERIC, OCLC, SCI 及 SSCI 等，便是學術工作者從事知識生產時所仰賴的重要工具，而這些資料庫及書目工具的共同特徵為，皆設立在工業大國，尤其是美國，所收錄內容也大多是這些國家的研究，因而具有強烈的主流性格與語言文化的局限性 (Altbach, 1987: 66)。

## (二) 剝削與依賴

誠如 Wallerstein 所言，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所以能運轉至今，其根本點在於核心地區和邊緣地區之間長期存在著不平等的交換 (Wallerstein, 1974)，而知識世界體系的演進，亦來自對不發達國家的剝削及邊陲對他們的依賴。其中審查制度、寫作慣例及書目控制成功地排除邊陲的學術進入核心，並樹立西方知識的霸權，更重要的是，這些控制手段還能進一步造就邊陲對核心學術的長期依賴，再製世界知識體系的結構，而在西方所掌控的知識場域裡，非中心地帶的學者即轉變其角色功能。

### 1. 閱讀代替寫作、傳播消費代替生產

既然在主流的學術媒體上發聲不易，邊陲地區的學者便乾脆將心力放在對核心學術的傳播上，以閱讀代替寫作，以消費代替生產。在仰之彌高鑽之彌深的情況下，許多邊陲地區的學者，更以介紹西方主流大師的理論為主要的學術活動，有的甚至以成為西方理論大師的詮釋者、代言人為職志。

在非核心的學術世界裡，常將翻譯西方學術作為重要的知識生產活動，並賦予翻譯幾乎等同於學術創作相同的地位。以台灣為例，正式學術寫作的引文慣例裡，總將譯者的名字取代原著者的位置，例如《新聞學研究》的論文體例裡「翻譯文獻」的標明方式，只註明譯者姓名即可，不必特別說明是翻譯作品，且「若不知原書作者、書名或出版年，則不需標明。」(新聞學研究, 2001: 146)；另有不少學者希望能將翻譯列入教授升等的考核之一(陳巨擘, 2001:92; 章英華, 2000)。

因此，不論是否在西方留過學，邊陲學者所從事的學術活動是消費傾向的傳播活動，他們被訓練為中心學術的聽眾與消費者。這樣的學術活動性質，有利於核心國家的學術出版業，邊陲學者購買、傳播核心的學術出版品，確保核心國家的書籍在邊陲地區的銷路，而在購買學術書籍與尊崇西方學術權威的同時，邊陲學者又對核心學術再次進行傳播，這種知識上的依賴，與政治、經濟上邊陲對中心的依賴並無不同，扮演著再製的角色。

## 2.知識的國際分工與不平等的交換

在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裡，核心國家的發達往往來自對邊陲的剝削，而令人驚訝的是，知識上的剝削與資本的剝削模式，竟然如此類似。在經濟上，西方企業家取得邊陲國家的原料，加工製造成品，再賣回邊陲以求利潤；西方的學者也往往自邊陲取得原始資料，據以寫成報告，再讓邊陲學者閱讀、援引以證明自己研究的合法性，甚至以核心學者的論點指引該邊陲社會的未來研究方向。

此外，透過留學活動，核心國家的學者藉由邊陲留學生所蒐集的資料，得以方便認知，甚至加工製造成自己的論述，進一步累積核心國家的學術權威和文化資本，造成一種只有這些學術知識，才是真的，才是有價值的假象，進而造就學術權威的神話，成就西方的知識霸權。

在知識的生產、傳播與消費過程中，出版佔有關鍵性的位置，任何學術創見若非刊登在主流學術期刊上，便少有機會被收錄資料庫內，尤其是非核心的其他語言的知識生產與研究發現，幾乎無法進入主流知識傳播的環節內。而資料庫的建立，又是資本、科技高度密集的行業，實非未開發國家短期內所能勝任，因此在世界通行的資料庫及學術研究工具中，邊陲的知識始終無法被有效地傳播。

由於邊陲學者的學術研究很難登上主流刊物，使得核心學術圈的學者得以借用邊陲學者未出版的資料或登在不知名期刊上的文章，使用核心的語言在國際主流的期刊或出版品中發表。核心國家的學者利用其取用主流期刊的方便性，在邊陲學者得以發聲之前，

即聲稱自己論點的原創性。Canagarajah (1996) 即發現，來自中心的學者對邊陲區域的研究，有大量引用「未出版」或「出版中」手稿的傾向，而這些被核心學者引用的邊陲學術，始終不曾受到重視。更有甚者，地方脈絡的研究甚至必須引用中心的學術來證成。因此在學術的國際分工下，西方主流學術界扮演的是生產與傳播的角色，而邊陲國家只能充當消費者罷了。

書目控制更是左右學術交換的工具，世界各地的學術圖書館便是利用西方學術主流建立的 Books in Print、SSCI 及 SCI 來選購圖書及期刊。由此，除再次加強核心國家學術不可動搖的主流地位外，又能確保其學術出版業的既得利益。由此可見，西方中心國家透過學術出版場域的佔領，並運用書目控制的手段，在不平等的交換關係中，獲得文化、經濟的利益，進一步累積文化與經濟的資本。

#### 四、臺灣學者在知識的世界體系的角色與功能

為瞭解台灣學者在知識的世界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本研究於 2001 年 10 月至 11 月間，採隨機抽樣法，依據教育部《八十九學年度大專院校概況統計》名冊，針對 53 所國、私立大學(不含學院)的社會科學及人文系所，剔除語言、文學或明顯具區域研究特色的學門後<sup>7</sup>，隨機抽出 200 個系所，再透過網路連結，由各系所隨機抽出 2 名專任教師，共 400 位大學教師為樣本，進行問卷調查。問卷統一於 2001 年 10 月 20 日郵寄，至 11 月 30 日止，共回收 142 份，回收率為 35.5%，扣除空白或未完成之廢卷，有效問卷為 126 份，有效回收率為 31.5%，調查結果以 SPSS 8.0 程式為協助分析工具。

##### (一) 樣本描述

---

<sup>7</sup>由於本研究旨在瞭解台灣學術界在世界知識市場的位置及對中、外學術文獻的使用狀況，因此有必要隔離一些必然參考某特定國家、區域的文獻或學術資料的科系，例如外文、英語、俄語、法文及西班牙文等語文或文學系，以及特定區域研究如美國研究、日本研究等科系。

本研究回收的有效樣本中，女性 31 位 (24.6%)，男性 95 位 (75.4%)，女男比例約為一比三；在年齡方面，集中在 31 至 50 歲之間，佔 80.2%；其中又以 41 至 50 歲最多 (41.3%)，31 至 40 歲次之 (38.9%)，30 歲以下的只有一位；最高學位部分，回函者 87.3% 擁有博士學位，碩士學位者佔 12.7%；私立大學教師佔 54%，國立大學教師佔 46%；取得最高學位年度方面，集中在 1960 至 2001 年之間，其中高低比例依序為 1990 年代 (61.3%)、1980 年代 (25.8%)、2000 年以後 (7.3%)、1960 年代 (3.2%)、1970 年代 (2.4%)；取得最高學位的國家方面，49.2% 自美國取得最高學位，其次是台灣 (38.9%)，其餘國家所佔的比例皆很低 (不超過 5%)，依序分別為英國、日本、德國、紐西蘭及加拿大，英語系國家即佔了四個 (美、英、紐、加)；目前職級方面，以副教授最多 (41.3%)，其次為教授 (29.4%)，再其次是助理教授 (23.8%)，講師人數最少，只有 7 位 (5.6%)；研究專長方面，本研究以行政院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的「學門架構」為分類依據，將台灣學者的研究專長分為十三個學門，統計結果以管理學門最多 (31.0%)，其次是經濟學門 (14.3%)、政治學門 (10.3%)、社會學門 (9.5%)、教育學門 (8.7%)、傳播學門 (5.6%)、法律學門 (5.6%)、歷史學門 (5.6%)、哲學學門 (2.4%)、人類學門 (1.6%)，心理學門人數最少 (0.8%)。

## (二) 大學教師的知識產能

學術出版是知識產能的重要指標，雖然質量並非等同，但在品質認定不易的情況下，從數量亦可一窺知識生產的究竟。本研究調查台灣大學教師學術圖書出版與期刊論文發表的數量，統計結果如下：

### 1. 學術圖書出版

- (1) 126 位大學教師共出版了 258 本學術書籍，平均每位出版 2.05 本，其中出版最多的是 21 本，最少的則是 0 本。
- (2) 258 本學術書籍中，中文 239 本 (92.6%)，只有 19 本是以外文出版 (7.6%)；計 10 人曾以外文出版學術書籍，其中 9 人以英文出版，1 人以德文出版。

- (3) 所有回函者中，以未出版學術書籍的為最多，佔 41.3%，其次是出版 1 冊者，佔 16.7%，出版 2 冊者有 14.3%，而有八成以上 (81.7%) 的大學教師出版冊數不超 3 冊。

## 2. 期刊論文發表

- (1) 回答的 124 位教師 (有 2 人未作答)，共在期刊上發表過 2,304 篇學術論文，平均每位發表 18.58 篇；最高為 200 篇，最低是 0 篇。
- (2) 其中以發表 21 篇以上的最多 (26.6%)，其次是 6-10 篇 (21.8%)，再其次是 11-15 篇 (12.9%)，而有 5.6% 的大學教師未曾在台灣或國外的學術期刊上發表任何文章。
- (3) 這 2,304 篇學術論文中，86.3% 是在台灣的期刊中發表的，外國期刊發表僅佔 13.7%。
- (4) 在台灣期刊上發表過最高篇數的是 192 篇，而有 14.5% 的教師未曾在台灣的期刊上發表任何論文。發表 1-5 篇 (42.7%) 者最多，21 篇以上者次之 (22.6%)，再其次是 6-10 篇 (16.9%)。
- (5) 在外文期刊上發表過最高篇數的是 40 篇，有 51.6% 的教師不曾在國外的期刊上發表論文。
- (6) 60 位曾在國外期刊發表論文的學者中，絕大多數是在英語系國家 (美國、英國、新加坡、澳洲) 的期刊上發表 (77.2%)，其中又以在美國的期刊上發表的人次最多，達 40 次 (50.6%)，英國次之 (22.8%)，再其次是日本、德國，皆為 5.1%。

若將學者的最高學位取得國家與其學術著作、論文的出版數量一併考慮分析，則可發現：

1. 在台灣取得最高學位的 49 位大學教師，共出版了 122 本著作，平均出版 2.49 冊，其中 99.2% 是中文著作 (121 冊，平均每人 2.47 冊)，外文著作共只有 1 冊 (平均每人 0.02 冊)。

2. 自國外取得最高學位的 77 位大學教師，共出版了 136 冊著作，平均出版 1.77 冊，其中 86.8% 為中文著作 (118 冊，平均每人 1.53 冊)，外文著作共 18 冊(平均每人 0.23 冊)。
3. 自台灣取得最高學位的 48 位大學教師 (有 1 人未回答)，在各國期刊中總共發表了 980 篇論文，平均發表 20.42 篇，其中 94.4% 是在台灣的期刊中發表 (925 篇，平均每人 19.27 篇)，在外文期刊上發表的有 55 篇(平均每人 1.15 篇)。
4. 自國外取得最高學位的 76 位大學教師 (有 1 人未回答)，在各國期刊中共發表了 1,324 篇論文，平均發表 17.42 篇，其中 80.3% 是在台灣的期刊中發表 (1,063 篇，平均每人 13.99 篇)，在外文期刊上發表的有 261 篇(平均每人 3.43 篇)。
5. 整體而言，在台灣取得最高學位的大學教師其學術生產量高於自國外取得最高學位者，在學術著作部分平均多了 0.72 冊，在期刊發表論文部分則平均多了 3 篇。但經由卡方分析結果 (學術著作： $X^2=5.856$ ,  $DF=3$ , 期刊論文： $X^2=5.338$ ,  $DF=5$ ) 發現，自台灣與自國外取得最高學位者的學術出版量，其差異並未達顯著水準。
6. 在中文著作及在台灣發表的期刊論文方面，仍以在台灣取得最高學位的大學教師較多，學術著作平均多 0.94 冊，台灣期刊發表篇數平均多 5.28 篇；但在外文著作方面，則國外取得最高學位的大學教師的產量較高，學術著作平均高了 0.21 冊，外文期刊論文則平均多了 2.28 篇。
7. 無論是否有留學國外的經驗，台灣大學教師的學術生產大多以中文為媒介、以本土期刊為主要發表管道，但自國外取得最高學位的學者出版外文書籍、在國外期刊發表的比例較自台灣取得最高學位者高。

### (三) 大學教師的知識傳播與消費

為瞭解台灣大學教師的知識傳播與消費行為，本研究分別調查大學教師最常閱讀的學術期刊、最具權威的學術期刊認定、最常閱

讀圖書的出版公司、最具有影響力的出版公司認定、經常閱讀與引用之文獻、本身教學的參考資料和教學指定學生參考資料，統計結果如下：

### 1. 最常閱讀的學術期刊

台灣大學教師最常閱讀的 387 種(次)期刊中，77.0%為英文期刊，中文期刊佔 20.2%，其餘為日文 (2.1%)、德文 (0.8%)。若以出版國家來看，則這些期刊以在美國出版的最多(58.1%)，台灣次之(19.4%)，英國居第三位(12.1%)，其他依序為荷蘭、日本、瑞士、大陸、德國，唯所佔比例皆不高(不超過 5%)。

### 2. 最具權威的學術期刊認定

以使用語言來看，台灣大學教師所列的最具權威的期刊中，88.8%是英文期刊，只有 8.9%是中文期刊，其餘語言如日文、法文、俄文、德文比例皆很低，分佈在 0.4%至 1.1%之間。在出版國家方面，以美國所出版的最多(66.5%)，英國次之 (15.2%)，台灣再次之，但不及一成的比例 (9.3%)，荷蘭則只佔 3.7%，其他國家如日本、加拿大、法國及德國，只有零星提及，所佔比例皆不超過 2.2%。若拿台灣大學教師認為具權威性的期刊與 SSCI 或 AHCI 所收錄的期刊名單做一比較，發現高達 75.1%的期刊名單重複出現，比最常閱讀期刊的重疊率還高 (58.9%)。若以單一出版國家來看，則美國、英國、荷蘭及瑞士等四國所出版的具權威的英文期刊，皆有八成以上的名單與 SSCI 或 AHCI 重疊，而日本、法國、德國、香港等區域所出版的權威期刊，完全未收錄在 SSCI 名單中出現。若依語言來看，則集中於少數語言的趨勢更為明顯，台灣學者認為最具權威的期刊中，會出現在 SSCI 的，只有英文期刊，其他語言皆無；若以單一語言來看，則學者認為權威的英文期刊中，接近九成 (88.8) 屬 SSCI 或 AHCI 中的期刊。

### 3. 最常閱讀圖書的出版公司

大學教師列出最常閱讀的出版公司出版品，依回函顯示共列出了 338 家 (次)出版公司，這些出版公司 69.8%以英文出版學術書

籍，使用中文的出版公司佔 20.2%，其餘為日文 2.1%、德文 0.6%。這些出版公司的所屬國家以美國最多 (46.7%)，台灣次之 (26.3%)，英國再次之(18.9%)，其他依序為日本、荷蘭、加拿大、中國大陸、德國、泰國，但所佔比例皆不高(未超過 3%)。其中大學出版社及學會者共有 20 家 (出現 67 次，19.8%)，以屬美國者最多，佔了四分之三 (15 家)，英國次之(2 家)，荷蘭、日本及台灣皆只有 1 家；這些學會或大學出版社絕大多數以使用英文為主(18 家)，使用日文、中文者各只有 1 家。被提及的出版公司中前十名依序為：McGraw Hill、Prentice Hall、John Wiley & S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五南圖書公司、Oxford University Press、Routledge、Sage、華泰出版公司、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和三民書局。

#### 4. 最具影響力出版公司的認定

學術界最有影響力的出版公司，回函者共列出了 289 家 (次)，其中 74.4% 使用英文，中文出版公司則佔 23.2%，其餘依序為日文 1.7%、德文 0.7%。這些被認為深具影響力的出版公司，以美國最多 (142, 49.1%)，英國次之 (66, 22.8%)，美英兩國共佔了 71.9%；其次為台灣(61, 21.8%)，其他國家依序為日本、荷蘭、中國大陸、德國、泰國，但所佔比例皆不超過 2.1%。這些出版公司中，大學出版社及學會共有 18 家(24.2%)，其中以屬美國者最多 (15 家)，英國次之(2 家)，日本 1 家，台灣的大學出版社或學會並未列名其中。最有影響力的出版公司其排名依序是 McGraw Hill、Prentice Hal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Oxford University Press、John Wiley & Sons、Sage、Routledge、五南圖書公司、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華泰出版社。在學會及大學出版公司方面，共有 18 家被台灣學者認為具影響力，其中以劍橋大學出版社、牛津大學出版社、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哈佛大學出版社和加州大學出版社被提及的次數最多。

#### 5. 經常閱讀與引用之文獻

依調查顯示，大學教師從事學術研究時有 60% 以閱讀英文文獻為主，未曾閱讀者有 3.2%；37.6% 以閱讀中文原著文獻為主，未曾閱讀者有 2.4%；11.2% 以閱讀中文譯著文獻為主，未曾閱讀者有 24.8%。台灣大學教師在經常接觸的文獻方面，以英文最高（總分 550，平均數：4.40），中文原著次之（總分 500，平均數：4.00），再其次是中文譯著（總分 356，平均數：2.85），而日文、德文、法文及俄文的分數皆不高，平均數皆未超過 2。若以各語言被選擇的比例來看（即眾數），則英文及中文原著被選為主要閱讀文獻的次數最多，英文又比中文原著高（英文：75 次，60.0%；中文原著：47 次，37.6%）；中文譯著則是被選為經常閱讀的次數最多（35 次，28.0%）；其餘語言皆是被選為未曾閱讀的次數最多，分別為俄文（99.2%）、法文（96.0%）、德文（89.6%）及日文（78.4%）。

在文獻引用方面，有 67.2% 大學教師以引用英文文獻為主，未曾引用者有 1.6%；37.6% 以引用中文原著文獻為主，未曾引用者有 8.0%；11.2% 以引用中文譯著文獻為主，未曾引用者有 35.2%。若以各語言被選擇的頻率來看（即眾數），則英文及中文原著被選為主要引用的次數最多，英文被選為主要引用的比例又遠高於中文原著（英文：84 次，67.2%；中文原著：47 次，37.6%）；其餘語言則被選為未曾引用的次數最多，中文譯著為 35.2%、日文 76.8%、德文 86.4%，而法文 92.0%、俄文 99.2% 等皆有九成以上的回函者未曾引用過。

## 6. 本身教學的參考資料

台灣大學教師在教學時本身經常參考的資料，以英文得分最高（總分 564，平均數：4.51），中文原著次之（總分 498，平均數：3.98），再其次是中文譯著（總分 374，平均數：2.99），而日文、德文、法文及俄文的分數皆不高，平均數皆在 1.5 以下。若以各語言被選擇的比例來看，則以英文被選為主要閱讀的次數最多（78 次，62.4%），其次為中文原著（48 次，38.4%）；中文譯著則是被選為經常閱讀的次數最多（39 次，31.2%）；其餘語言皆是被選為未曾閱讀的次數最多，分別為俄文（98.4%）、法文（96.0%）、德文（89.6%）及日文（80.0%）。

## 7. 教學指定學生參考資料

台灣大學教師教學時指定學生參考的資料，以英文最高（總分 512, 平均數：4.10），中文原著次之（總分 507, 平均數：4.06），再其次是中文譯著（總分 364, 平均數：2.91），而日文、德文、法文及俄文的分數皆不高，平均數皆在 1.5 以下。若以各別語言來看，則英文及中文原著被選為主要閱讀的次數最多，英文被選為主要閱讀的比例為 48.8%（61 次），中文原著則為 44.0%（55 次）；其餘語言皆是被選為未曾閱讀的次數最多，分別為中文譯著（41 次, 32.8%）；語言，俄文（98.4%）、法文（97.6%）、德文（95.2%）及日文（88.8%）。

### （四）大學教師學歷背景與學術傳播、消費行為

本研究進一步以卡方分析法，檢驗自台灣或國外取得最高學位的大學教師與其經常閱讀、引用、教學參考及教材指定之各種語文文獻的差異情形，結果不同求學背景的學者在閱讀及引用英文文獻、教學參考及指定學生英文教材等四項的差異達到顯著水準，在其他語文文獻部分則無顯著差異，說明如下：

#### 1. 最高學位取得國家與閱讀英文文獻

自台灣與自國外取得最高學位的大學教師，在閱讀英文文獻的頻率方面有顯著差異（ $X^2=24.717$ ,  $DF=4$ ,  $P<0.001$ ），自國外取得最高學位的大學教師中，以主要閱讀英文文獻者最多（74.0%），經常閱讀者次之（19.5%），亦即 93.5% 的國外留學背景的學者從事學術研究時以閱讀英文文獻為主；至於自台灣取得最高學位的學者中，則以經常閱讀者最多（39.6%），主要閱讀者次之（37.5%），共有 77.1% 主要或經常性地閱讀英文文獻。由此顯示，台灣大學教師不論是本土或國外取得最高學位，其閱讀英文文獻的頻率皆很高，但國外留學背景的學者閱讀英文文獻的程度又更甚於自台灣取得最高學位者。

#### 2. 最高學位取得國家與引用英文文獻

自台灣或國外取得最高學位的大學教師，在引用英文文獻的程度方面，達到統計上的差異水準（ $X^2=16.912$ ,  $DF=4$ ,  $P<0.01$ ），自國外取得最高學位的大學教師中，以主要引用者佔最多數（80.5%），經常

引用者次之 (16.9%)，亦即高達 97.4% 的國外留學背景的學者，在其學術著作或論文中主要或經常引用英文文獻；至於台灣最高學位的學者，也是以主要引用者較多 (45.8%)，經常引用者次之 (43.8%)，主要或經常引用英文文獻者合計為 89.6%。此一數據顯示，台灣大學教師不論是自本土或國外取得最高學位，引用英文文獻的頻率皆很高，但國外留學背景的學者主要引用英文文獻的程度又遠高於自台灣取得最高學位者。

### 3. 最高學位取得國家與本身教學參考英文資料

自台灣或國外取得最高學位的大學教師，在教學時參考英文文獻的程度方面有顯著差異 ( $X^2=27.332$ ,  $DF=4$ ,  $P<0.001$ )，自國外取得最高學位的大學教師中，近八成表示教學時主要參考英文文獻 (79.2%)，經常參考者次之 (16.9%)，亦即高達 96.1% 國外留學背景的學者在教學時通常參考英文文獻；至於在本土取得最高學位的學者中，則以經常使用者最多 (35.4%)，主要使用者次之 (35.4%)，偶爾使用者再次之 (18.8%)。所以，整體而言，國外留學背景的學者教學時，參考英文文獻的程度較自台灣取得最高學位的學者高。

### 4. 最高學位取得國家與教學指定學生參考英文資料

自台灣或國外取得最高學位的大學教師，在指定英文資料給學生閱讀方面有顯著差異 ( $X^2=13.901$ ,  $DF=4$ ,  $P<0.01$ )，自國外取得最高學位的大學教師中指定英文為教材的比例，以主要指定者最多 (61.6%)，經常指定者次之 (20.8%)，即八成以上 (81.8%) 的國外留學背景學者主要或經常指定學生閱讀英文教材；至於台灣最高學位的學者中，則是以經常指定者最多 (37.5%)，主要指定者次之 (29.2%)，偶爾指定者次之 (25.0%)，主要或經常指定英文教材者為 66.7%，顯示台灣大學教師中，國外取得最高學位者比自台灣取得學位的學者更傾向主要指定英文資料。

綜合上述，台灣大學教師在從事學術研究時所經常閱讀、引用的文獻上，或是教學時參考、教材指定方面，國外取得最高學位者皆比自台灣取得最高學位者更傾向於使用英文文獻資源，由此可推

論，留學經驗與否對台灣大學教師在學術再生產、傳播與消費素材的選擇上的確有所差異。顯現國外留學背景的學者對西方知識的傳播與消費行為高於自台灣取得最高學位的學者。

### (五) 大學教師的學術評比與認同

在知識的世界體系中，大學教師的認同傾向與學術評比具有反映與建構的作用，因此認同與評比是建構的過程也是結果。經問卷調查統計結果台灣大學教師對各國學者的學術等級評比、建議留學的國家、以及評比自不同國家取得最高學位的台灣學者受重視程度，結果如下：

#### 1. 對各國學者的學術等級評比

在台灣大學教師的心目中，各國的學術等級由高至低依序如下：美國、英國、德國、法國、加拿大、日本、澳洲、義大利、俄國、台灣、韓國、西班牙、中國。在美國部分，選擇第一級(5分)的次數最高，達 86 次(剔除無意見後的比例為 78.9%)，而選擇無意見的比例是各國中最低的，顯示台灣學者對於美國學術等級的領導地位十分篤定。美國、英國所獲得的評價皆很高，各有 96.3% 及 86.1% 評價皆為 4 分以上。

另外，雖然德國、法國的總分並不比日本、加拿大高，但其總平均卻高於這些國家，顯示雖然許多台灣教師對此二國的學術表現並不熟悉(回答無意見的比例分別為 34.2% 及 49.1%)，但回答的學者中，對其評價仍然偏高，德國有 72.0%、法國有 56.9% 被評價為 4 分以上。

台灣及中國大陸總分居各國之中等地位，但平均數卻落後各國，顯示台灣學者對於此二地的學術成就雖較為熟悉，並大多願意予以評價，惟評價皆不算高，在中國大陸方面，只有 11.8% 的學者認為其等級在 4 分以上，而有 60.0% 的學者認為其學術成就為 1 或 2 分；至於台灣的學術等級則有 23.7% 的學者認為其在 4 分以上，而大多數的學者給予中等評價：3 分 (48.5%)。

#### 2. 建議台灣學生留學的國家

在台灣大學教師的心目中，會建議其學生留學的國家，由高至低依序如下：美國、英國、德國、加拿大、法國、日本、澳洲、義大利、俄國、中國、西班牙、韓國。此順序大抵與其學術等級的評價相同。其中美國、英國所獲得的評價皆很高，平均數各在 4.72 及 4.21；在美國部分，選擇 5 分的比例最高，高達 90 人（剔除無意見後的比例是 82.6%），而不表意見的比例卻是各國中最低的，顯示多數台灣大學教師對美國的留學環境熟悉，且樂意建議學生前往；而英國也是台灣大學教師非常青睞的國家，在表達意見的 100 人中，有 86 人對留學該國的評價在 4 分以上。

整體而言，英國、德國、加拿大及日本等四國被學者評為 4 分的次數最高，而法國、澳洲及俄國大多被評為 3 分，最不建議留學的國家則屬義大利、西班牙、中國大陸及韓國，這些國家所得到的評價大多集中在 2 分或 1 分，尤其是韓國，不僅平均數位居各國之後，且只給予 1 分或 2 分評價的學者高達 70.0%。

### 3. 對不同國家取得最高學位的台灣學者的評價

台灣大學教師對自各國取得最高學位的學者所重視程度的評價，由高至低依序為：美國、英國、德國、加拿大、日本、法國、澳洲、台灣、義大利、俄國、西班牙、中國大陸及韓國。此順序與學者建議留學國家及各國學術評價的出入不大。美國所獲得的評價依然最高，平均數為 4.74；英國及德國則以平均 4.13 及 4.05 列為第二及第三高的地位，俄國、西班牙、中國大陸及韓國，仍然被給予最低評價。

若以各別國家來看，在對美國發表評價的 107 位學者中，有高達 87 人（81.3%）給予最高評價 5 分，而給予 4 分以上評價的學者共計 103 位，高達 96.3%；英國被給予高評價的比例也很高，表達意見的 104 位學者中，有 87 位（83.7%）給予 4 分以上的分數；至於德國、加拿大、日本及澳洲等四國，雖然學者認為所受重視程度不如英美，但仍有不少學者給予 4 分的評價；反觀台灣及義大利則多數獲得中等評價 3 分（台灣：58.4%；義大利 40.4%）；而俄國、西班

牙、中國大陸及韓國則多數獲得較低的評價，得分皆集中在 2 分或 1 分。

## 五、結論

如同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一樣，知識世界體系的演進史，也是一部建立在知識分工與不平等交換基礎上的階級史。西方世界演化為今日知識的中心，是依照西方利益重構知識秩序的結果。在知識的世界體系中，存在著知識的空間等級，即中心和邊陲的關係，核心國家（由少數國家，尤其是美、英、德、法等國所組成）是世界上學術知識的最大生產者及輸出者，而邊陲國家則是知識的消費者與輸入者，兩者知識的交易基本上是單向的由中心向邊陲輸入。這些核心國家不僅掌握了世界上絕大多數知識的生產，也進一步控制了知識傳播的工具。象徵知識強權的世界核心國家，掌握了學術出版，也就掌握了世界知識的流動內容與方向，成為世界學術研究的標準局，變成學術發展的守門人。

學術出版是學術工作者爭取文化資本、知識權威的競爭場域，在知識體系的建構裡，西方挾其優勢的經濟、科技資本，造就世界優勢的出版王國，再利用在學術出版上的強勢，進一步增強西方學術知識的中心化，以及西方學術組織的支配性地位，這便是當今知識世界體系的運作真相。這場競爭遊戲中，邊陲學者只能是旁觀者或註定是失敗者，因為知識趨勢的定義權及實踐的優先權，一直操控在核心學術圈。核心國家利用其優勢的學術出版機制，建構一種扭曲的圖像，即任何有價值的知識生產只發生在核心學術界，而這些有價值的作品也都發表在他們手中的主流刊物。相對的，邊陲世界的學者由於缺乏有效的傳播的工具，而被貶謫為次等的「地方性知識」，而半邊陲地區或許只能成為核心國家知識生產的衛星工廠，甚至淪為知識的經銷商罷了。由此學術出版上的霸權，成功地再製了核心—邊陲的關係，也再製了核心國家知識上的霸權。

然而，無論是核心國家如何利用其經濟、科技、政治、文化的優勢，還是利用審查制度及寫作慣例對邊陲學術的控管，都不是邊陲地區被邊緣化的唯一原因，事實上，「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 的形成向來不是強迫的或被動的被接受，而是在被動者成為主動者之後才有可能得以實現，這也是 Gramsci 定義霸權的基本核心。正是作為被動者的邊陲學者向作為主動者的邊陲學者的轉化，才使得西方學術霸權制度在邊陲學術界得到某種程度的再生產，從而增進西方的知識利益與增強其宰制的機制。例如台灣學術制度，以 SSCI 做為大學教師的升等依據，這種盲目跟隨西方標準，卻未考慮學術條件及本質上差異的獎勵制度，是否能真正提昇台灣學術水準頗令人質疑(曾孝明, 2001: 42)，但其對鞏固且強化西方的知識霸權，卻無疑發揮了相當的功能。

以場域分析的觀點而言，社會經濟等其他場域的因素，並不是直接對社會科學場域中的研究者發生影響的，套用 Bourdieu (1992: 23-24) 的話來說，對置身一定場域中的行動者(或知識分子) 產生影響的外在決定因素，從來不直接作用在他們的身上，而是只有先通過場域的特有形式和力量的特定中介環節，預先經歷了一段重新形塑的過程，才能對他們產生影響。許多非西方學者或多或少曾受過西方大學的學術洗禮，而在這洗禮的過程中，不只接受知識的內容，也接受了涉及知識價值的認識論、方法論活動，並因而蒙受其益。Bourdieu (1992: 105) 指出：「任何符號支配都預先假定，在受制於符號支配的社會行動者那裡，存在某種形式的共謀關係，這種共謀既非被動地屈從於一種外在的約束，也不是自由地信奉某些價值……符號暴力的特殊性恰恰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即它要求那些被支配的人具有一種態度，這種態度使自由和約束之間那種尋常的對立站不住腳。」

這種「契合」、「共謀」關係絕非一般的屈服或反抗的關係，它構成了一種其自身無以克服的愈陷愈深的邏輯循環，即其他場域通過學術制度為那些研究者的做法，提供了非關學術本身的合法

性，而他們的這些作法反過來又強化了這些學術制度。正是這種契合關係與邏輯循環，使得知識霸權的地位獲得確立與鞏固。

本研究調查發現，台灣大學教師不論研究時所閱讀、引用的文獻，或是教學時參考的資料、指定學生閱讀的教材，都是以英文為主，除指定學生英文教材的比例與中文教材相差較不懸殊外，其餘主要使用英文版本的比例皆遠高於本國的學術文獻；而這些大學教師在其研究領域上經常閱讀的期刊及出版品，以及認定最具影響力、權威的期刊及出版公司，絕大多數都是以美國為主的英文學術出版，這些證據顯示，在世界的知識體系內，台灣大學教師對英文學術出版品的倚重程度，以及台灣學者如何忠誠地擔任西方核心國家知識的傳播者與消費者的角色。或許我們不能就此斷定台灣學術場域處於邊陲地位，但不可否認的是，台灣學者所從事的學術活動，具有邊緣性格傾向。

而在學術的評比與認同上，台灣學者心目中學術等級最高的國家，非西方莫屬（前五名為美、英、德、法、加）；建議台灣學子留學的國家，以西方國家為主（前五名為美、英、德、加、法）；而對於自不同國度取得最高學位的台灣學者評價，亦以留學西方國家者為首（前五名為美、英、德、加、日）；然而對台灣學術地位及在台灣完成最高學位的學者的評價，分別是十三個國家中的第十一名及第九名。台灣大學教師對西方學術的孺慕之心，及對本地學術及學者的低度評價，由此可見其學術認同的取向。

Wallerstein (1999) 指出整個 19 和 20 世紀，邊緣地區的國家在文明上走的是一條無所適從的“Z”字型道路。Wallerstein 把處於弱勢民族國家的「行路方式」生動地描述為「東奔西闖」。普遍主義是？者給弱者的一種禮物，致使後者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因為拒絕這種禮物是失敗，接受這種禮物也是失敗。弱者唯一可行的反應，是既不拒絕也不接受，或既拒絕也接受。這種看似非理性的東奔西闖，成了 19 世紀特？是 20 世紀歷史的特徵，殖民地只是一個以不斷的努力證明自己永遠不能成功的模仿者。

然而我們必須反思的是，知識經濟的主體在於文化，尤其是文化霸權的論述與主導，在西方學術霸權的宰制下，台灣人文社會科學逐漸變成蒼白虛弱，欠缺歷史與傳承，在知識的傳播過程中，充滿「橫向移植」的思維邏輯，以致變成生吞活剝各種外來符號消費。因此所謂批判馬克思主義、解構主義、建構理論、後現代思潮，在乍然現身後不久都會很快失去蹤影，因為它們若不是為政治服務，便是跨國資本運作邏輯下的產物。就像 McCathy(1996:80)所稱的「熟悉的異鄉人」(familiar stranger)一樣，台灣學術界受西方影響甚深，大學教師對西方學術理論如數家珍，不但引用的文獻，包括平日閱讀、教學參考或指定教科書，大部分以西方知識版本為主，對台灣本土學術反而保持著距離或欠缺深度的理解。知識經濟的關鍵處在於創新，而文化的創新基礎必須來自於歷史與傳承。台灣幾十年來快速前進的進程中，早已失去回眸凝視歷史的能力與深度，一個缺乏歷史感的學術社群，又怎能產生傲世的知識文明？

## 參考書目

-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1998)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台灣圖書出版市場研究報告》。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 吳明德 (1987) 《我國公立大學圖書館支援研究所學術研究之探討》。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 李德竹 (1992) 《我國圖書館教師研究趨勢及資訊需求之調查報告》。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 教育部 (2001) 一九九六年至二〇〇一年我主要留學國家留學生人數統計表 (Online) Available: <http://www.edu.tw/bicer/c9/c9110116-1.htm>.
- 許維德 (1999) 簡介「北美洲台灣研究論文年會」- 兼論台灣研究在美國的發展 , *Taiwanese Collegian Magazine Online*, 21. Available: <http://tc.formosa.org/magazine/tcm-21/21-6.html>.
- 陳世敏 (2001) 半世紀台灣傳播學的書籍出版 , 《新聞學研究》, 67: 1-23。
- 陳巨擘 (2001) 學術書籍翻譯市場的困境 , 《當代》, 167, 92-99。
- 陳旭耀 (1997) 《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碩士論文及其引用文獻之研究》。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論文。
- 章英華 (2000) 學術出版、評審與學術發展：一個社會學家的參與觀察 , 《台灣社會學刊》, 23: 1-23。
- 曾孝明 (2001) 《臺灣的知識經濟：困境與迷思》。台北：群學出版公司。
- 新聞學研究 (2001) 稿約及論文體例 , 《新聞學研究》, 67: 145-152。
- 鄭傳民 (1998) 世界體系理論：對西方國家發跡史的強烈質疑 , 《中華讀書報》 (Online) Available: [http://www.gmdaily.com.cn/0\\_ds/1998/19981007/GB/10-ZHDSBCLASS.HTM](http://www.gmdaily.com.cn/0_ds/1998/19981007/GB/10-ZHDSBCLASS.HTM).

鄭麗敏 (1994) 《近二十年來台灣地區圖書學與資訊科學期刊論文引用參考文獻特性分析》。私立淡江大學教育資料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Altbach, P. G. (1997, January, 10). Straitjacket scholars. *South China Mornin Post*, 10.

Altbach, P. G. (1987). *The knowledge context: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Altbach, P. G. and Mcvey, S. (1975). Preface. *The Annals of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Social Science*, 421.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995).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Washington: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Bailey, F. G. (1977). *Morality and expediency: The folklore of academic politics*. Oxford: Blackwell.

Baldauf, R. B., & Jernudd, B. H. (1983). Language of publications as a variable in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Australian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6, 97-108.

Barnard, W. M. (1957).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iterature used by American authors of journal articles in library science*. Unpublished Ms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Barnett, C. and Low, M. (1995). *Towards a political economy of academic publishing*. Discussion paper.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The University of Reading, UK.

Bazerman, C. (1987). Codifying the social scientific style: The APA publication manual as behaviorist rhetoric. In J. S. Nelson, A. Megill, & D. N. McCloskey (Eds.), *The Rhetoric of the Human Sciences* (pp.125-144).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Ben-David, J. (1977). *Centers of learning: Britain, France, Germany, United States*. New York: McGraw Hill.

- Bhatia, V. K. (1993). *Analysing genre*.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 Bogart, D. (1998). *The Bowker annual: Library and book trade almanac*. New Providence, New Jersey: R. R. Bowker.
- Bolles, C. A. (1975).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iterature of American studies as indicated by bibliographic citation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 Bookbank (computer file) *Whitaker Bibliographic Services*. London: Whitaker & Sons Ltd.
- Bottle, R. T. and Efthimiadis, E. N. (1984).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literature: Authorship and growth patterns.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9: 107-116.
- Bourdieu, P. (1991).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Cambridge: Polity.
- Bourdieu, P. (1993).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London: Polity Press.
- Bourdieu, P. and Loic J. D. Wacquant.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rodkey, L. (1987). *Academic writing as social practic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Budd, J. M. (1985). *Characteristics of research materials used by American literature scholars: A citation studie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t Chapel Hill.
- Canagarajah, A. S. (1996). 'Nondiscursive' requirements in academic publishing, material resources of periphery scholars, an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Written Communication*, 13 (4), 435-474.
- Coffman, J. W. (1985).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a selected literature dealing with the humanities from 'The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 Crotty, R. (1999). *Towards a sociology of academic publishing*. Annual conference paper. Melbourne: Australian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Education.
- Curwen, P. (1986). *The world book industry*. London: Euromonitor Publications
- Euromonitor (1992). *The Euromonitor world book report*. London: Euromonitor.
- Foster, D. L. (1969). Magazines in the library school.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 9: 144-148.
- Foucault, M. (1976). *The archeology of knowledge*. (A. Sheridan, Trans.). New York: Harper & Row.
- Garfield, E. (1978). The science citation index as a quality information filter. In K. Warren (Ed.), *Coping with the bio-medical literature explosion: A qualitative approach* (pp.68-77). New York: Rockefeller Foundation.
- Garfield, E. (1983). Mapping science in the Third World,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10, 114-126.
- Ghai, O. P. and Kumar, N. (1984).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today*. Delhi: the Bookman's Club.
- Gibbs, W. W. (1995). Information have-nots. *Scientific American*, May, 12-14.
- Harris, J. (1989). The idea of community in the study of writing. *College Composition and Communication*, 40(1), 11-22.
- Heilbron, Johan (1999). Towards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Book translations as a cultural world-system.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2(4): 429-444.
- Henkel, M. (2000). *Academic identities and policy change in higher education*. London and Philadelphia: Jessica Kingley Publisher.

- Heussman, J. W. (1970). *The literature cited in theological journals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seminary library circulatio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 Homi Bhabha (199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NY: Routledge.
-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00-2001). *Open doors*. New York: IIE.
- ISI (2001). ISI Database: The journal selection process (Online). Available: <http://www.isinet.com/isi/hot/essays/selectionofmaterialforcoverage/199701.html>.
- Kaplan, R. B. (1966). Cultural thought patterns in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Language Learning*, 16, 1-20.
- Karki, R. (1996). Searching for bridges between disciplines: An author coitation analysis on the research into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22, 324.
- Knorr-Cetina, K. D. (1981). *The manufacture of knowledge*. Oxford, UK: Pergamon.
- LaBoire, T. and Halperin, M. (1976). Citation paper in library science dissertations.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 16: 271-283.
- Leavy, M. D. (1996).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nd the rise of the '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 1892-1920, *Publishing Research Quarterly*, 1(3), 30-79.
- Lievrouw, L. A. (1989). The invisible college reconsider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6(5): 615-28.
- Lingwood, D. A. (1969).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roductivity, and invisible college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
- Lorimer, R. (1993). The socioeconomy of scholarly and cultural book publishing.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5, 203-216.
- McCarthy, E. D. (1996). *Knowledge as culture: The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McMahon, M. E. (1992). Higher education in a world market: An historical look at the global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study. *Higher Education*, 24, 465-482.
- Muchiri, M. N., Mulamba, N. G., Myers, G., & Ndoloi, D. B. (1995). Importing composition: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academic* writing beyond North America. *College Composition and Communication*, 46(2), 175-198.
- Myers, G. (1985). Texts as knowledge claim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wo biology articles.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15, 583-630.
- Okerson, A. (1989). *Report of the ARL serials prices project*. Washington: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 Omoruyi, J. (1978). Social science dissertations: Characteristics of bibliographic citations. *Unesco Bulletin for Libraries*, 32 (3): 172-177.
- Owen, L. (1997). *Selling Rights* (3rd ed).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Books.
- Paisley, W. J. (1972). The rold of invisible colleges in scientific information transfer. *Educational Researcher*, 1(4), 5-19.
- Plonyi, K. (1944) .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Farrar & Rinehert .
- Price, D. J. (1961). *Science since Babyl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Ritzer, G. (1980). *Sociology: A multiple paradigm science*. Allyn and Bacon: Boston.
- Russak, B. (1975). Scholarly publishing in Western Europe and Great Britain: A survey and analysis. *The Annals of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Social Science*, 421 .
- Said, E. (1978). *Orientalism*. Harmondsworth, UK: Penguin.
- Sardar, Z. and Loon, B. V. (1997). *Cultural studies for beginners*. Cambridge: Icon Books Ltd.

- Schott, T. (1991) The World scientific community: Globality and globalization, *Minerva*, 29, 440–462.
- Schott, T. (1998). Ties between center and periphery in the scientific world system: Accumulation of rewards, dominance and self-reliance in the center. *Journal of World-Systems Research*, 4(112), 112-144.
- Schumpeter, J. (1939). *Business cycles: A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process*. New York: McGraw Hill.
- Smolicz, J. (1974). Fragmentation in science and educ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ty structure of science, in S. Murray-Smith (Ed.) *Melbourne studies in education* (pp.1-58).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 Swales, J. (1990). *Genre analysis: English in academic and research setting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he Publishers Association (1999). Key facts summary (Online). Available: <http://www.publishers.org.uk/key%20Facts/Keyfactssum.htm>.
- The Publishers Association (2000). Key figures 1999 from the book trade yearbook 2000 (Online). Available: <http://www.publishers.org.uk/paweb/paweb.nsf/0/D7CF3277E6F3BF1980256ADA003BD593!opendocument>.
- The Publishers Association (2002a). DTI value of UK book exports by country (Online). Available: <http://www.publishers.org.uk/paweb/paweb.nsf/0/C3DB9416E53AB93680256ADA003BD597!opendocument>.
- The Publishers Association (2002b) .UK publishers' export sales by sector (Online). Available: <http://www.publishers.org.uk/paweb/paweb.nsf/0/C419D19AA203DF6B80256ADA003BD59D!opendocument>
- The Publishers Association (2002c). UK book industry in statistics 2000 (Online). Available <http://www.publishers.org.uk/paweb/paweb.nsf/>

79b0d164e01a6cb880256ae0004a0e34/dc527714d11bf5b280256b19005322ec?OpenDocument.

The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s Office of Consumer Goods (2002a.2.25). Top 200 U.S. export destinations for books (Online). Available: <http://www.ita.doc.gov/td/ocgbookexpworld.htm>.

The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s Office of Consumer Goods (2002b.2.25). Top 25 import sources of books (Online). Available: <http://www.ita.doc.gov/td/ocg/imp2731.htm>.

Unesco (1965–96). *Statistical yearbook*. Paris: Unesco.

Unesco (1992). *International flows of selected cultural goods 1970-1987*. Paris: Unesco.

Unesco (2000). *International flows of selected cultural goods 1980-1998. (Executive Summary)*. Paris: Unesco.

Unesco (2001). *World education report 2000*. Paris: Unesc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allerstein, I. (1974).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 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Wallerstein, I. (1999).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 Social science for the 21st century*, Minneapolis,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The production, dissemination and consump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Taiwanese academic field**

—An analysis of academic publication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Ming-Li Chen**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and Sociology,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UK

## Abstract

Adopting Wallerstein's world-system theory and Bourdieu's field theory, this thesis examines the production, dissemination and consumption of knowledge around the world and tries to investigate the formation of the 'world-system of knowledge'. Additionally,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ademic capital and the subjective/objective positions of agent, seeks to analyze the competing and operating mechanisms of the global intellectual field. Finally, a survey of Taiwanese university teachers in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veals the roles and functions which they perform in the world-system of knowledge.

The relevant statistics and evidence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knowledge,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a hierarchical structure, imbalance exchange and a dynamic system, corresponds extremely closely with Wallerstein's world-system theory.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academic activities among Taiwanese scholars tend to be marginal. In the globalised knowledge system, Taiwanese scholars serve only as disseminators and consumers of Western knowledge. It is therefore

claimed that the grounding of imported academic knowledge, reinforcing the attention of indigenous academic work and establishing Taiwan's own scholarly publishing system is needed to remedy the marginalizing of the Taiwanese academic world.

Keywords: academic publishing, field theory, world-system theory,  
academic autonomy